

(作者工作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
武汉430072)

2 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范式因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即它既整合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又超越于它们之上),这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研究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回避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和对立,因此被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政策执行和评估的研究。(德洛尔在《公共政策制定检讨》中将政

其次, 70、80年代, 政策科学加强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尤其是政策执行及评估的研究。这种由政策制定向政策执行的研究重心转移, 构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公共管理”范式出现的一个契机(公共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政策执行的管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首先发表了一篇《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报告》, 指出政策执行的政治与行政的方面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有些学者如哈格罗夫指出, 在政策形成和政策成功之间存在着一个忽略或错失了环节——政策执行, 必须加以补充, 才能使政策生效; 加州大学的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等则对奥克兰实验案例进行详细的跟踪研究, 写成经典性的《执行》一书。该书令人信服地指出, 再好的政策方案, 如果没有正确、有效的执行, 仍

